

◀ (上接14版)

年),一张是道光二十八年戊申(1848年)。酒庄名“万昌永”,主人为曾子范。酒票开头即写:“本号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三江所,精造重料佳酿,运往京都及闽广等省。”又如编号第七,酒庄名为“章东明坊”、同治十年辛未(1871年)的酒票写:“本号系浙绍山阴县阮社村章东明坊,重加工本,自造绍酒,南北驰名,已历有六十余年。咸丰十年间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字号绍酒局,并带运南来一切杂货。今于同治八年上海大东门外洪升码头中间开张章东明真利川绍酒栈。……”它不但运销京都及闽广,而且在运输去往京都及闽广的重要水路码头天津和上海开设了转运、销售的酒店。应该是销售量很大才会有此必要吧。

在全部酒票中,章东明坊酒票占的比例在一半以上,计五十九张。尚有版面模糊、字迹完全不能辨认的酒票二三张,其中有的版面形态和章东明的酒票相似,个别字可以对上、可以认定是章东明的。这五十多张酒票的印制和版式亦有不同。最早的、编号第七号、同治十年(1871年)的酒票版式是并列两围框,而文字却连页跨框而行。其他多数是单一围框。早期多数是木版雕印,后期改为铅印。文字大同小异。木板雕印的酒票,即使同一样式、同样文字的,有时也似乎不是出于同一块雕版。铅印的酒票,甚至有版式、文字都相同而小围框的花纹却不同的情况。章东明在天津、上海开设酒店是在清末,所以在天津设在侯家后,在上海设在大东门。这都是当年最繁华的地方。不过,以天津而论,辛亥革命以后,侯家后逐渐没落,天津的繁华中心早就逐渐转移到了天津南市和法租界劝业场一带了。而在这些酒票中未见有所反映。我自幼就知道,我家历来是到一家名叫长源酒店的店去买黄酒。而在上海开设的酒栈,在章东明铅印酒票中有少数几张中,“由咸丰十年在上海大东门外开设章东明绍酒栈,真利川为记”一段文字已改为“由咸丰十年在上海法租界开设章东明绍酒栈,老正号为记”,这大概是由于繁华中心转移到租界,因此酒栈也迁移到法租界了。酒票上文字显然是在原有文字上挖改而成,未经仔细斟酌。因此,若按文字理解,还以为咸丰十年酒栈就设在法租界了呢。

因为章东明酒票数目较多,占的比例大,有一情况这里须说一下。在木刻版的章东明

酒票中有两类:一是版面并列两框,一是全票面正文只有一框围绕。两者主要相同之点有二:一是声明“本号系浙绍(另一种票“浙绍”作“浙江”)山阴县阮社村章东明坊”;另一点是,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字号绍酒局,在上海大东门外洪升码头中间开张章东明真利川绍酒栈。两框票末署“山阴章东明主人”,一框票末署“山阴聚德全主人”。这或是同一家的两种写法,或是两家,都无碍。但有一点差别令人不可解,只能说是矛盾了。两框票写的是,“咸丰十年间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字号绍酒局,并带运南来一切杂货。今于同治八年上海大东门外洪升码头中间开张章东明真利川绍酒栈”。而一框票则写的开设年代完全不同:“咸丰二年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酒局。正卿荣堂字号为记,不致伪误。由咸丰十年在上海大东门外开设章东明绍酒栈,真利川为记。”一个是咸丰十年和同治八年,另一个是咸丰二年和咸丰十年,这样的矛盾是无法解释的。由于兄弟各支都有酒坊开设,用祖上同一字号是可以理解的,但似乎不可能两家同样在天津上海两地、同样市区地点,开设同样字号的酒栈吧!这样的问题只有留给专家去研究了。

绍兴黄酒的生产,都是手工业作坊,家族企业。几代之后,各房子弟都用同一字号,难免产生矛盾。如第三号票中所云,“奈本号各家分造者多碱缺,美璞辨别甚难。”又如第二十二号票中所云,“向来四房分造。今因子孙苗莠不齐,将此照牌租卖异姓。”这种情况,在田姓德润征记票中也有充分的反映。这些票在正文中开头都写“本号向在浙绍山阴佳制德润征(或‘德润号’)倬云显路酒”等文字。再加上有“倬云显记”印章。看来,“德润征”、“倬云显”都是他们全族共享的老字号。至于两者关系则不得而知了。票的上端横列大字,有四家用本房专用名号,共十五票。有两家用各房共有字号“德润征记”,共二票。还有一家,除各房共有字号“德润征记”外,下又一行横列本房专用名号,共四票。最后还有一张票上端无大字横幅,只在文字最后署“德润征记星农主人谨啓”。除有“星阶监造”印之外,另有木戳印记“章锡候章仲候督造”,则已经不是田姓造的酒及酒票了。今将此田姓酒坊各票开列于下,以便考究。

〔一〕票顶端横列大字:

“培初坊造”。有印章:“倬云显记”、“田培初造”。第八、九、三十八号票。

〔二〕票顶端横列大字:“培初定记”。有印章:“倬云显记”、“田定轩造”。第十、十一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三十九票。文字中有“我父培初公”等字,知是田培初之子。但仍得另立字号。可能兄弟不止一人也。

〔三〕票顶端横列大字:“祉脩坊造”。有印章:“真倬云显”、“田祉脩造”。第十六、三十四、三十六、一百零二票。文字中有“我祖培初公”等字,知是田培初之孙。

〔四〕票顶端横列大字:“画九坊造”。有印章:“倬云显记”、“田画九造”。第二十、五十四票。

〔五〕票顶端横列大字:“德润征记”。有印章:“老倬云显”、“田百初造”。第十三票。

〔六〕票顶端横列大字:“德润征记”。有印章:“倬云显记”、“田虞耕造”。第三十票。

〔七〕票顶端横列大字两行:“德润征记”、“星农监造”。第三票(无印),第二十四票(有“申甫”印),第三十五票(有“德兴昌造”印),第五十八票(有“申甫”印)。

〔八〕票顶端无大字横幅。文字最后署“德润征记星农主人谨啓”。除有“星阶监造”印之外,另有木戳印记“章锡候章仲候督造”。

从上面所开列的酒票情况看,已可以看到家族企业的种种纠葛情况之一斑了。另外,关于黄酒的名称得说几句。第十五号,萧源顺高记号的酒票,其中有“聘请特等技司督造善酿、花雕进京”等字。第十四号票中写明酒名为“竹叶青”。前述唐鲁孙文中也列举“花雕、太雕、竹叶青、女儿红”等等酒名,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了,可知京庄黄酒有时会给以种种名称。但是,在我印象中,当时只是某酒庄给他们自己的酒取的名称(或许按他自己定的等级,但没有各酒庄公认的定义),好像没有哪个人能够喝了一杯黄酒后能说出这是花雕,还是竹叶青,或这是善酿来的。也就是说,这些名称不代表某一特定类型的酒,只是如此说说而已。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,黄酒统一由国营酒厂生产,有统一的标准,有统一的名称,情况就不同了。加饭有加饭的质量标准,善酿有善酿的质量标准,我们喝一口就知道这是

善酿或加饭,因为善酿偏甜。也因为那时代也不可能有)别家造出同样的酒而另取名称来造成混淆。因此我可以在本文中用加饭来代表那深褐色、较浓酊、香气不及京庄的绍兴酒,在本篇文字中是不会发生混淆和误解的了。但是,请注意,改革开放后造酒企业的头绪又形成多端了。命名、质量,又都不统一了。现在黄酒又出现各种酒名,虽然颜色仍都是深褐色的。前些时我想买一瓶黄酒待客,在超市找不到加饭,我就拿了一瓶花雕回来,想不会有什么差别的。

前面说过,我父亲是个有情趣的人。他喝黄酒,还收集了这样多酒票。不但如此,他还在酒票后写了十几条批注。好在字数不多,我逐条抄在下面,并稍加注释,作为本文的结束。

〔一〕第二号题记:“癸酉闰五月,颂臣约饮道光戊申酒于李园。色淡如茶,味清于水。余携景良去,时年六岁。”

(景良按:李颂臣先生是我父亲好友,是天津本地“八大家”之一“李善人”之第三代。李园,天津人称李家花园,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人民公园,地在今天津河西区。我记得父亲当时说带我去喝八十年陈酒。戊申是道光二十八年,公元1848年。喝酒时是癸酉年,是公元1933年。是酒已八十五年,说八十年酒只是说其大概。当时是在花园内一座前面敞开(其他三面无印象)的中国旧式楼阁的二楼上设了一桌酒席。我当时年幼,对酒没有那么深兴趣,不安于座,跑来跑去。上酒时,父亲还把我叫到跟前给我喝了一些酒。)

〔二〕第四号题记:“老云集数坛色皆重。”

〔三〕第七号题记:“同治辛未酒,仲融见赠。味苦、色稍重。时壬申八月。”(景良按:刘仲融先生,父亲好友。与某著名民主人士同名。)

〔四〕第九号题记:“癸酉二月,笃文四十初度。余以光绪丁丑酒为寿。色、香俱佳。”

(景良按:劳健先生,字笃文,父亲好友。)

〔五〕第十三号题记:“光绪己亥酒,勉之约饮。色、香、味皆佳,尤物也。”

(景良按:李勉之先生,父亲好友。)

〔六〕第十四号题记:“‘竹叶青’三字仅见此票,亦醉乡之掌故也。”

〔七〕第三十号题记:“光绪癸巳酒。味微苦,近杏仁。甲申八月沽于长源酒店,良不易得。此酒以缸碗封坛口,亦罕见。”

(景良按:长源酒店之名,幼时常常听到。似乎我家买黄酒只在此一家。)

〔八〕第三十一号题记:“宣统辛亥酒,色极淡,而味与香稍逊。内票为全城明,坛外则印德润征,殊不可解。甲申八月。此酒封口亦用缸碗。”

〔九〕第三十三号题记:“庚申纪年用墨书,亦罕见。”

〔十〕第三十九号题记:“丙戌十二月,勉之召饮。此酒色、味皆佳。泥头仅存‘癸’字。余以此票与壬辰年为一版,故审定为光绪癸巳也。”

〔十一〕第四十号题记:“此酒色重。乃从同仁堂药铺散出者。”

〔十二〕第四十一号题记:“色淡味不佳,非京庄也。”

〔十三〕第五十七号题记:“戊子正月,笃文得此酒于长源。色清而香永,有杏仁味,远胜前瓮。”

〔十四〕第六十一号题记:“笃文约饮。色淡似德润征所制。坛外涂红色。丁亥正月。”

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把这一套酒票出版。这不仅可以为我父亲的收藏留一纪念,更可以作为制酒史料提供有关人士作为参考。至于我写的这篇文字,原是谈我父亲和酒。正因为当年他们喝的是京庄黄酒,而今日黄酒中京庄已不存在,不能以今日的黄酒去想象他们当日的品位和乐趣,故不得不加以辨明如此。

(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)